

《韓振華選集》之一

《中外關係歷史研究》序

先師 韓振華教授仙逝不覺已逾六載。念及他過早辭世帶給中外史學界的損失，悲痛之情每每難以平伏，誠非言語筆墨可以形容；所幸經過師母及眾師兄弟多年的努力，先師心血結晶——《韓振華選集》終於可望在世紀之交面世，內心始稍感一絲慰藉。

自1954年踏足廈門大學歷史學系，自己就榮幸地拜於先師門下，相繼聆聽多門課程講授，包括《魏晉南北朝史》、《印度尼西亞史》等。1958年畢業後，北上赴中央民族學院任教，本以脫離母校南洋研究陣地而時感惋惜，孰料“文革”後期竟又自定南洋交通史地考證為未來志向，由是而與先師畢生專長緊密相繫，寧非運氣使然？！

猶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，當自己正埋頭編撰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時，忽聞振華先師蒞京，當即趨前拜訪、再次求教。先師侃侃而談，以下列一席話給摸索多年未見光明的弟子，增添了無比的勇氣，頓感前景無限開闊：“編撰資料性工具書是功德無量的善事，在南洋交通地名方面尤其如此。為免引用書名、卷數冗長乏味，每條可先引一關鍵性的史料。”此情此景，迄今猶歷歷在目宛若隔日。1981年5月，在中外關係史學會創立之際，自己得以重返母校，又一次聆聽先師教誨，深感獲益匪淺。

在拙著《中外交通史》，自己曾這樣評價本行的老前輩：“馮承鈞、張星烺、向達三位先生對包括西域、南海在內的整個中外交通之研究貢獻尤大，被譽為‘北大三傑’，其拓荒之豐功偉績實不可沒。”如果平情而論，在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內地，以中外關係史、海外交通史、華僑史乃至東南亞史的領域綜合而論，則先師韓振華和已故的先輩姚楠、朱傑勤等先生，實可謂鼎足而立的“神州三傑”。這絕非溢美之辭，而是編完《韓振華選集》後的肺腑之言。每多校對一遍，均為

先師之博覽群書、蒐羅宏富、縝密考訂及獨特創見，而由衷感佩和拍案叫絕。其實，目前所見的《韓振華選集》五卷本，僅是先師已發表或已完成未發表的文章匯集，尚有不少文稿或資料卡片猶待整理、編輯。由是自己對先師治學之勤謹，更增添一分敬意。

誠然，由於國家科研任務的繁重，以及培養子弟的辛勞，先師不僅不能把畢生所學全部貢獻出來，未及把所有成果一一公諸於世，就連許多史地問題的考證結論也遠未完成。好在學術發展總是承前啟後、代代相傳的。先師生前曾提起過學術大家丁謙的一段話：“文章，公器也。是非所在，無用迴護，指予疑誤，願拜厚貺。”今後，在南洋史地研究諸領域，只要海內外學界出現任何一點新成就，先師在天之靈定會感到無比欣慰的！

陳佳榮 1999年8月於香江南溟齋

(載《中外關係歷史研究》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年出版)